

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上)

蔡德贵

一、纪伯伦的宗教背景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1931)是阿拉伯世界近代最负盛名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享有和印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齐名的地位。

纪伯伦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东方文学家,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思想上,他都是一位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他出生在黎巴嫩,长在美国;出身于基督教马龙派家庭,却有反叛宗教的性格;他精通母语阿拉伯语,又能用英语写作;他住西式楼房、用欧洲壁炉、喝阿拉伯咖啡、用中国红木酒杯喝威士忌、吃猪肉香肠……总之,他的作品既充满东方情调,挟带着黎巴嫩山野的神秘,同时又饱蘸西方方式的激情,充满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美的讴歌。他的思想是综合的,一幅他自己创作的宗教画最能说明这一特点。这幅画是通过半截宝塔来表现的,塔顶由三个头像组成,左边是埃及的拉神头、右边是尼采笔下查拉斯图拉的头、中间是菩萨头,菩萨头上顶着一个球,象征无垠的现实。菩萨胸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只手搭着拉神的肩,另一只搭着查拉斯图拉的肩,从他被钉的双肩下直到宝塔底层,是形形色色的人。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世界性思想的闪光”,“将成为调和世界的甘泉”。“他的诗远远超越了描绘东方的神秘感,而是在向我们倾心传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因此他被称为“是推动世界大同和宗教统一的先驱者之一”。“是罕见的、能够真正超越东西方隔阂的作家之一,是当之无愧地自称为世界公民的人,尽管他同时还是一名黎巴嫩人,一个爱国主义者”。^[1]

二、纪伯伦对东西方哲学家和宗教的认识

在纪伯伦的作品中,涉及东西方不少哲学家,如中国的孔子,阿拉伯的伊本·西拿、安萨里、伊本·鲁西德,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尼采等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尼采。

对纪伯伦来说,伊本·西拿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是哲学家,而在于他是诗人。纪伯伦认为,在古代阿拉伯人所写的诗歌中,伊本·西拿最接近自己的信念和心理倾向,因为伊本·西拿写下了人类思想中最深远的东西,知识所产生的想像中最深刻的愿望,希望所升华的疑问以及持续思维、长久考虑所

产生的观点。在纪伯伦看来,伊本·西拿是他那个时代的天才,他有用毕生时间探索身体秘密和物质特征的特点,通过物质的方式获知灵魂的隐秘,通过可见的东西了解合理的内涵。连他的诗也是鲜明的例证,证明了科学是智慧的生命,科学家从实际的试验逐步转向理性的观念,达到精神的感觉,直至真主。伊本·西拿不仅在思想方面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其诗作也对西方有重要影响,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雪莱、戈蒂耶、布鲁诺等人的诗作中都不难看到他的影子,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同时期的几种不同思想,这使他不仅成为当时的一个天才,而且是以后若干个时代的天才,他的诗作也是题材最深远和最富光彩的。^[2]

纪伯伦对安萨里的哲学思想了解得比对伊本·西拿的更多。在他看来,安萨里和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之间有着一种心理联系,是一个原则下的两种相似现象。这种原则就是注重内心的实际倾向,它使人从可见的事物及其表面现象转向合理的事物,转向哲学和神学。安萨里期待社会具有高度文明,他通过连续不断的探索,将科学的结果与宗教联系起来,进一步研究把人们的理解、试验同人们的感情、理想混杂起来的神秘问题。而与安萨里同时代的圣奥古斯丁则早他5年写出了《自白》一书,探讨了将地球及其未来作为攀向存在最高良知的阶梯。只是安萨里比圣奥古斯丁更接近事物的核心和秘密,这是因为安萨里继承的是阿拉伯和希腊科学原理,而圣奥古斯丁继承的则是基督教教会头面人物的思想。因此,纪伯伦断言,继承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从一种思想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一代又一代,某些民族的外表是同有形的特性分割不开的。同时,纪伯伦也发现,在安萨里的思想中,有印度神秘主义和佛教的成分,而在斯宾塞和威廉·布莱克的作品中,又有安萨里的情感。这使安萨里具有双重影响,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和科学家眼中,他具有崇高地位,与伊本·西拿、伊本·鲁西德一样是第一流的哲学家。而神学家们则认为他的思想是伊斯兰教出现以来最崇高和最显赫的。奇怪的是,西方人比东方人更了解安萨里,有不少翻译著述,研究理论,探讨其哲学特点和神秘主义目标,而阿拉伯人却很少谈论和提到他,其原因是阿拉伯人至今仍忙于外表,而不注重内心,似乎外表就是生命之

海到达白昼的黑夜之岸的全部。

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尼采是纪伯伦最推崇的人物,其哲学对纪伯伦有重大影响。纪伯伦感到,尼采是他最重要的向导,最大的助手,也是他孤独中最伟大的友人,没有尼采的陪伴,没有查拉斯图拉同他一道漫游,他就不会存在。他的内心对尼采充满无上敬意:这人真是个伟人!他以“超人”的名义独自与世界交战。在这场战斗中,世界剥夺了他的理智,但他死得像矮人中的超人,在疯狂的神智昏迷者中像个明智的疯子,让人们就这样去说吧!让疯子们就这样发疯吧!他的想象力是何等丰富!只需一刹那,他就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再一刹那,他就剥去由人们虚弱所形成的所有好与坏的薄膜。让想象力去翱翔吧!这真是神来之笔。只一笔就创造一个新世界,再一笔又抹掉一个旧世界。

尼采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支配的西方文明。但纪伯伦从尼采这里只继承了其人要不不断超越自己的思想,吸收其富于自由精神的因素。他喜欢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查拉斯图拉对世界的批判在《读与写》一节中的训诫:从前精神是上帝,其后它变成人,现在它甚至变成了流氓;在《美德歪曲人们为侏儒》一节中,查拉斯图拉尖刻地嘲弄人们的一切,地位、准则和宗教。都给纪伯伦很深的影响。这之后的纪伯伦更爱对人们进行讥讽、攻击他们的神,认为神是人造的,是人崇拜自己的产物,人类从一开始就崇拜自己,但使用的名称不同,表现不同的爱好和希望——有时称之为伯阿勒(腓尼基人所崇拜的太阳神),有时称“木星”,再有时就称“上帝”。^[3]

从这里也可看出,纪伯伦的宗教信仰淡薄,有时表现出极为矛盾的态度。他本人生活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双重背景的人群中间,宗教意识却又似超越了这两大宗教,精神成了他信仰的最高形式,他虽承认任何精神都体现在上帝之中,但上帝是什么?上帝被他喻为陶工、射者、至高无上的诗人,上帝把宇宙、世界和人生凝聚起来并赋予其意义,因此,上帝永远是人们崇拜、追求和热爱的对象,是一切思想感情的核心和终结。但是,上帝其实就是人自己,人就是上帝,上帝是长了双翼的人类,是纪伯伦经常重复的话。在纪伯伦看来,上帝是因人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

不仅上帝是人造出来的,耶稣的故事也是人编出来的,所以,纪伯伦还耶稣以人子的地位,他写先知,写耶稣,也只是写普通人,不过耶稣走在众人之前,想得更多,看得更远而已。先知是智慧而孤独的,在精神上居高临下俯瞰人生,人们崇敬他、

需要他,却未必能理解他,他象征着人的精神追求和终极理想,表现人的超验而神秘的宗教情绪。^[4]

在这样的矛盾心态下,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一神还是多神,纪伯伦的态度游移不定。在纪伯伦笔下,在思想之城居住着两夫子,他们互相憎恨,互相贬损对方的学识,一位是无神论者,另一位是有神论者,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搞不清到底是有神论正确,还是无神论正确,这正是他们辩论的结果。

即便这样,纪伯伦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上帝和宗教,因为在他看来,宗教无非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既然宗教信仰有益于人类精神的升华,那么就让宗教存在好了,但是天堂却不在虚幻的天上,而就在人间,甚至就在自己身边,在门后,在隔壁屋里,稍微带一点自觉和知识,就可以向天堂奔去。如此看来,上帝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关心上帝也就是关心人。或许,通过分析纪伯伦对各种文化的观点,会更清楚地认清他的宗教观本质。

三、纪伯伦的哲学和文化观

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那里一直是多种宗教并存,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身为阿拉伯人的纪伯伦出生在一个基督教马龙派教徒之家,不是穆斯林。马龙派在基督教中属东正天主教的一个支派,是持守各种东方礼仪和典制的天主教和教会。叙利亚人马龙(MARON, ?-410)在叙利亚中部阿巴美创立该派,其隐修院是该派当时的活动中心。后来,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培开尔贝设立宗主教公署。十字军东征后,信徒大多移居黎巴嫩北部山区,这正是纪伯伦的故乡所在。马龙派作为基督教中的一派,有别于其他宗派之处是明显受伊斯兰教影响,规定神职人员也结婚,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保持古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可见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命中注定在纪伯伦的思想中会打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印记。

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经历,使纪伯伦能够跨越地域文化障碍,以更高的角度,从世界文化立场来看待文化问题,使他有可能摆脱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甚至宗教文化的传统或偏见,将多元不同文化视为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财富,从而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东西合璧。

在具体观点上,纪伯伦有许多与巴哈伊教相同之处,这是不谋而合,还是受阿布杜·巴哈的影响所致?尚无法用具体事实来证实。巴哈伊教有句名言:“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纪伯伦也说:“我爱故乡,爱祖国,更爱大地。”“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乡亲。”^[5]人们应该自由往来,所有的人应该共享地球上的财富,这种思想正是地球村的思想,与巴哈伊教的观点一致。面对

人间的纷争、互相残杀和宗教纠纷,纪伯伦对人间统治者发出质问: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王座和心情安宁,武装了德鲁兹人同阿拉伯人厮杀,鼓动十叶派同逊尼派抗争,煽动库尔德人去屠杀游牧民族,鼓动穆斯林抗衡基督徒。这种兄长杀害胞弟的状况要延续到何时?在上帝的眼前,十字架远离新月的状况,要延续到何时?^[6]

出于人类同源的文化观念,纪伯伦呼吁雅典的女儿、罗马的姐妹、摩西的女友、穆罕默德的妻子、耶稣的新娘团结起来,携手共进。纪伯伦说:“贫穷显示了心灵的尊贵,富裕暴露了灵魂的肮脏,悲哀同情善良,享乐令人头脑发昏。因为人对金钱和享乐贪得无厌。一如以经书的名义犯罪,经书无法为其开脱;用人道主义的旗号干下流勾当,同人道主义无相同之处。”^[7]在他看来,神性即人的精神实质,无法以金钱出售,纨绔子弟的欢乐不能助其生长,富人只顾聚敛财富,将神性抛开,花花公子们离开神性去寻欢作乐。^[8]纪伯伦以此说明精神文化远远高于物质文化,提倡让人去追求精神的超升。因此,他肯定地说:“是的,灵魂或精神上的苏醒对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是存在的根本目的。但是,文明,包括其外观、形式,不正是精神觉醒的需要吗?天哪!我们怎能否认已然存在的事物及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呢?也许当今的文明是短暂的偶然现象,然而永恒的规律能使偶然现象成为通往绝对本质的阶梯。”^[9]

就东西方文化而论,各有长短,应该互补。即以阿语为例,纪伯伦认为,语言是民族整体创造的一种现象,或是民族的一般自我。如创造力平息和停止了,语言也就停止发展;停滞中就有倒退,倒退则意味着死亡和毁灭。阿语的前途取决于讲、用阿语的各民族整体中现有的或非现有的创造性思维前景。假如创造性思维存在,阿语的前景如同它的过去一样远大;假如创造性思维不存在,阿语的前景将像它的姐妹古叙利亚语和希伯来语的现状一样。而创造力是一个民族中推动前进的决心,是民族内心对未知的饥饿、干渴和追求,是民族精神中的一系列理想,且昼夜不息地努力去实现它。任何一个理想并不是由系列环的哪一端实现的,而是由生活添加的新的一环。这种力量是个人的才智,集体的热情。个人的才智是将集体中隐蔽的不可见的爱好置于可感觉的明显的形式的能力。因此,如果讲、用阿语的各民族继续保持总体的创造力,阿语就有光明的前途。语言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会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影响就如同吃食物,语言从外界摄取,经过咀嚼,咽到肚里,其有益部分转化为有机部分。如果没有用以咀嚼的牙齿和消化的胃,食物就会白白地被排泄掉,欧洲文明和西方精神对

阿语的影响就是这样。他认为,西方人的精神既是阿拉伯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如能把握好它,便是朋友,如把阿拉伯人当作祭品,它便是敌人;如果从它那里得到适合阿拉伯人的东西,它就是朋友,如果阿拉伯人被置于适合它的位置,它就是敌人。所以,纪伯伦意味深长地说:至于西方精神,它是人的一种作用,生活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是永远前进的大军,语言、政府和各种派别正是由其道路上方飘荡的金色尘埃形成的。走在这支大军前列的各民族是创新者,创新者具有影响力;在这支大军尾部的各民族是因循守旧者,他们受影响。

当东方人先进时,西方人跟随着,我们的文明对他们的语言具有巨大影响;当他们变为先进时,我们追随着,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文明对于我们的语言、思想和道德具有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看,纪伯伦认为东方人是保守主义者,不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怀旧情绪远甚于注重现在和将来。阿拉伯人和东方人应改变这种习惯,摆脱《雅歌》的在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观念的束缚,不能只对模仿传统,而要有所创新。^[10]因此,他希望每个阿拉伯人都成为诗人,而诗人“是所有或大或小的发明家,是所有或强或弱的发现者,是所有或伟大或渺小的创新者,是所有生活的热爱者——不论其是宗教头领还是乞丐,是心惊胆战地站在昼夜前的人——不管其是哲学家还是葡萄园守望者”。^[11]

纪伯伦坚信,“每个东方人,在自己的田野间、苗圃里、织机前、庙宇中、讲坛上、办公桌旁,都能成为诗人。每个东方人都能把自己从模仿和传统的监狱里解放出来,走到阳光下,行进在生活行列中。每个东方人都能顺应隐藏在灵魂里的创造力——那是由上帝的子孙创建的永恒的力量。”^[12]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纪伯伦创造出大量新颖作品,将西方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与东方深邃隽永的哲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践着自己的文化观,表现着自己的哲学思想。

纪伯伦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所创作的富于哲理的散文中,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肉体与精神的关系、认识论、真理观、时空观等方面的问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纪伯伦提倡和谐。在他看来,自然是和谐的,自然界的竞争不过是混乱在渴望有序。人与自然应该相互依存,人与天地万物、花草虫鸟共同生息,生于自然,长于自然,最后回归自然。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生存的条件和美的享受,在自然界中有峰峦峡谷,大江湖海;有狂风呼啸,阳光绚丽;有四季交替,年轮互换;有飞鸟飞翔,夜莺歌唱……人在大自然中获取灵感,升腾精神。但人作为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有多重性,既

有神性，也有人性，还有低于人性的侏儒性。人性善而非恶，恶行只是善的扭曲或丧失。在自然状态下，人既不高于罪犯，也不低于先知，每个人的自我都是既小又大；既是碎片，又是苍穹；既是沙与沫，又是大海。所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每个自我都有完善自己的可能性，其方法就是用人的神性克服人的侏儒性。这样，人就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并最终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真我”，与万物合一，与真主合一，达到最高境界。^[13]

为实现与大自然合一，纪伯伦像中国哲学家庄子那样向往自然风光的田园生活。他叹惜人类随着现代文明的潮流走，直至忘记或几乎忘记那美好、朴实、充满纯洁和高尚的田园生活。在他看来，田园生活，如审视它，就会发现它在春天微笑，在夏天负重，在秋天收获，在冬天休憩；那生活的各个阶段就如人类的大自然母亲。城市现代文明中的人们，钱财比农村人多，但农村人的心灵比城市人高尚。城市人播种许多，却一无收获；农村人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城市人是自己欲望的奴仆，农村人是自我满足的儿女。城市人在生活的杯中啜饮掺有悲哀的苦涩，而农村人则畅饮清甜的甘泉。^[14]田园诗般的生活吸引着纪伯伦，可惜纪伯伦未能像庄子那样隐遁山林，垂钓秋水之溪，却最后英年早逝，回归到自然。

纪伯伦注重精神生活，追求精神超升。他在《有高柱的伊赖姆城》中虚构了一位以峡谷精灵闻名的阿米娜·阿莱维娅，通过她的口阐述了肉体与精神的关系。

在纪伯伦看来，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想象或精神状态，一切可见的东西和合理的事物都是精神状态。假如人闭上眼睛，望着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便能看到世界的普遍性和局部性，了解它的规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方法和媒介，理解所探索的道路。闭上眼睛，打开心之视力，就能看到存在的始与末，那个终点会变成起点，而起点又变成终点。每个人都可以渴望再渴望，直至渴望从视力中剥去表象的帷幕，能看到那本体。而看到本体，就看到了纯粹的生活内核。而每个本体者都是纯粹的生活内核。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人，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人的内部，所有存在于人内心的都在世界上。彼此之间最近和最远、最高和最低、最渺小和最伟大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一滴水中有着浩瀚大海的全部秘密，一粒原子中有着地球上所有的元素。一次思想活动中有着世界一切的运动和秩序。只要相信主，人的生命便没有尽头，人将同一切事物那样永存。人就是人，人就是一切，

所以人会永存，因为一切存在都是永存的。世界的存在是其永存的明证，而念头和想法正是科学之全部。如果没有念头和想法，世界上的科学也就不存在了，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世界上有些现象是奇怪的，如有人证明了感觉所形容的外表皮原子的存在，却又否认外表皮恰恰是为了原子而形成；有人论证了构成眼睛的各种元素的永恒性，却又怀疑将眼睛作为工具的视觉的永恒性；有人求证创造者永恒，却又得出起因消失的结论；有人注重形成的表象，而不顾表象的成因；有人将生命一分为二，只相信被动的一半，而否认主动的一半；有些人注视着那些沐浴在阳光下的山峦、平原，倾听着树枝沙沙引起的空气的语言，享用着花草的馥郁，又对自己说：“不，我所见所闻的不会逝去，我所知所悲的也不会消失。但是，正是这注视着一切的理智的灵魂害怕起来，沉思着，倾听着，高兴着，悲伤着；正是这感觉着的灵魂颤抖着，喜悦着，感知着，悲伤着，证实着；正是这被一切环绕的灵魂将像海面上的泡沫一样消失，像阳光直射下的阴影一样消失。……否认自己存在的存在者是值得惊讶的。”^[15]

纪伯伦认为，主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派遣使者，以引导人类走向光明。但是，有人在自己以外寻找生命，却不知道生命在人体内部。但是，人是在其内心的无限与其周围的无限之间存在。理性力量是不可见的，但是在人们中间没有人服从不可见的理性力量。有多少人在工作时，想象自己是选择者，而实际上却是被选择者。伟人则不同，其伟大之处正是对某一灵魂的完全服从，就如琴弦完全受琴手的拨动一样。因此，在可见事物的世界与理性世界之间有一条通道，人在不知不觉中走过，随后手捧着种籽回来，将其撒入日常生活的土壤，生长成宏伟的事业或不朽的言论。如果没有人们灵魂同以太灵魂之间开放的通道，人们中间就出现不了先知，就不会有诗人崛起，也不会有知识分子出现。

纪伯伦的灵魂论有神秘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献身于肉体的愿望，但并不轻视其他灵魂对人灵魂的意愿，他借精灵之口说：我们是一个世界拥抱的两个世界中的幻想，在一种状态包含的两种状态之中，在两种存在之中，这两种存在被一种普遍而永久的力量汇集一起：一种存在无始，另一种存在无终；它没有上，也没有下；既无限度，又无方向。^[16]

这种永久的力量就是灵魂，人通过科学研究和感觉的体验，了解人类灵魂凭借想象、心灵通过渴望所体验的东西，这一天总会来临。每一个想象都有现实，所有的思索中都有知识。因为心灵之镜反映出竖在它面前的东西，即使它不情愿，也做不到。这正如平静的湖水才让人看到深处的山峦、树木的

图案、云彩的形状,即使它不愿意,也做不到;又如灵魂中的细胞不会传回永恒的世界不为之真正颤抖的声音的回声,即使细胞不愿意,也做不到;又如光明不会将无本质的东西的影子投在地上,即使光明不愿意,也做不到。因此,他说:“信仰一样东西,就是了解这样东西;信仰者以其精神的视觉看到研究者和探索者用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以其内在的思维理解了研究者和探索者以模仿式的思维所无法理解的事物;信仰者以不同于所有其他人所用的感觉体验了神圣的真理,其他人则认为那是一堵密实的墙,边走边说:‘这座城市没有门。’”^[17]

因此,通过向往之道到达精神理想之城,既要由信仰之门进去,也要通过忍受饥饿的痛楚、干渴的灼烤、孤独的悲哀、隔离的恐惧才能到达。人在世间,要在光明之中走,靠着主的保佑走;又要凭着风刮不灭的真理之光走。至此,纪伯伦与巴哈伊教走到了一起——宗教所启示的真理和科学研究发现的真理,是并行不悖的,科学与宗教是相互协调的。在肉体与灵魂之间,人既要献身于肉体的愿望,又不要轻视其他灵魂对人的灵魂的意愿。纪伯伦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在这个充满喧闹和争斗的现实世界中,时刻要保持灵魂的洁净,就必须时时清算自己的灵魂,谴责它,抚慰它,考验它,永远保持灵魂的高洁和纯净。^[18]

在认识论领域,纪伯伦对认识事物、自我,对感觉都有自己的看法,形成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在认识事物方面,纪伯伦提倡要深入地观察事物,由表及里,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反对这样的人:观察事物往往比较肤浅,不能由表及里,抓住其本质;不能细心聆听心灵的旋律,刚听到一些响动便感情冲动;不去探索生活的真谛,被一些炫目的五光十色所左右;不去研究存在的奥秘,只顾一时的欢乐。这种人对人、对事都很轻率,不假思索便表示爱憎,而事后又后悔自己鲁莽,而这种后悔不仅得不到谅解和宽恕,反而会招致讥笑和嘲弄。^[19]

认识事物是困难的,认识自己更困难。纪伯伦提出“认识自我”的命题,他结合了一位西方理论家的思想,并采纳了一个东方导师的备忘录,借别人之口阐述说:“认识自我是一切认知之母,我应该认识自己。我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外貌、分子和原子。我应该除去覆盖在自己心灵秘密上的帷幔,抹掉心灵深处的装饰,还应该弄清我物质存在中精神存在之涵义,我精神存在中物质存在之隐秘。”^[20]认识自我的方法,当然要与别人做比较,但这种比较应该是深层的,而非表层的,比方说,一个人个子矮,而拿破仑也个子矮,因此便觉得自己也会像拿破仑一样伟大,这就错了。所

以,智慧之首是认识自己,是真正深层的认识,而非肤浅的认识。

人的认识难免有片面性,所以认识有相对性。对真理的认识也是这样。因为真正的光明是来自人的内部,向心灵阐述,使心灵为生活欢欣,以灵魂的名义歌唱;而真理像星宿,只在夜晚显现。真理就如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一样,谁感到无价值的残酷影响后,它才显示出自己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真理是神秘的感情,会因人而异,它教育人为自己的岁月感到欢欣,应该祝愿所有的人都得到这种欢乐。按照自己内心的神秘感情生活的人很多,相信这种感情是主为人类制定的法律的影子的人也很多,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岁月毫无欢乐感,而是从始到终,悲哀而死。在纪伯伦看来,这些使人对生活失望的信念和教导都是荒谬的,引导人们绝望、忧愁和苦难的感情是虚假的;因为在地球上应该幸福,应该知道幸福之路,不管到哪里,都要以主的名义讲这个道理。谁看不到这种生活里的天国,谁就看不到来世的天国;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当卑贱的流亡者,而是作为无知的儿童学习生活的美德和秘密,崇拜永恒的灵魂,考察自己的内心。这些都是与基督教一致的真理观。^[21]但是,真理无论怎样相对,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美早已存在一样,“生活”比生灵万物更古老,正如大地上美丽的物事产生之前,美早已展翅;亦如真理被道出之前,已先有真理。^[22]

真理客观存在,时空却来自神灵的创造。纪伯伦以文学家加神秘主义思想家的笔触,借神灵之口描绘了时空的被造:当大地脱离混沌而呈现,我们,鸿蒙的子嗣,在无欲之光里见到彼此。我们首次吐出沉寂而颤栗的声息,加速了空气和海水的流动。

然后我们携手共步,行走在初生的晦暝世界中。自我们最初慵懒的足音发出的回声里,诞生了时间。这第四位神灵,他的脚走在我们的足印之上。他的身影投射了我们的意愿与思想,他只有借我们的眼睛才能睹物察望。

生命驾临了大地,精神,这宇宙里有翼的旋律,降临了生命。我们支配着生命与精神,除了我们,再无人知道岁月的久远,及世代相续的朦胧之梦的积重。及至第七个兆年正午的高潮时,我们将大海出嫁给太阳。自它们新婚酣畅的洞房里,我们令人类登场,这生灵虽则柔弱,却永远带着家系的印记。

通过足履平地,目视群星的人类,我们发现通往大地遥远之邦的路径。我们还把人——这滋生在污水之畔的不起眼的芦苇,做成一管长笛,从空空的笛心里,我们把声音吹送到万籁俱寂的世界。^[23]

纪伯伦是一位典型的神秘主义思想家,他一只

